



政府·市场与经济变迁

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温锐/主编

ZHENG FUSHI CHANG YU JING JI BIAN QIAN

■……关于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演变，专家们认为，这里的关键在“选择”二字。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中国人民一直都在不断地“选择”、“再选择”。通过对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的历史考察……从长时段、多角度透视近世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探讨中国经济加速实现新增长方式的转变……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政府·市场与经济变迁

责任编辑 辛康楠

书籍设计 昇 同昇设计事务

■……关于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演变，专家们认为，这里的关键在“选择”二字。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中国人民一直都在不断地“选择”、“再选择”。通过对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的历史考察……从长时段、多角度透视近世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探讨中国经济加速实现新增长方式的转变……



ISBN 978-7-210-03713-2



9 787210 037132 >

定价：38.00元

政府·市场与经济变迁

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温锐/主编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府·市场与经济变迁;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温锐主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210-03713-2

I.政... II.温... III.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2859 号

政府·市场与经济变迁

——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温锐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正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1.5 插页:2

字数:400千 印数:1-1000册

ISBN 978-7-210-03713-2 定价:38.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从左至右)吴照云、张东刚、董志凯、廖进球、李小南、刘国光、刘运来、吴太昌、伍世安、赵德馨、武力等领导与专家在研讨会开幕式上



(从左至右)颜鹏飞、柳·伊·康德拉绍娃、赵梦涵、刘建生、郑会欣等作大会发言



(从左至右)王玉茹、方宝璋、谢国兴、陈争平等作大会发言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刘国光教授在会上作“经
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学
术报告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
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吴太昌教授在大会上发
言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
长董志凯教授在大会上
发言

中国经济史学会副
会长武力教授在大会上
发言





江西财经大学社
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温锐教授在大会上发
言



分组讨论会场



中外歌声中的经济变迁



追踪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前言

江西财经大学 温 锐

晚清以来,一直处于急剧变动之中的中国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前行,经历了多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再选择的实践。最近20多年来,通过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跨越式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前进的历史新时期。但是,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阶段的到来,各种新旧经济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并成为近年中国民众与学界特别关注的热点。2005年5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西财经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会在江西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众多学术研究的一个侧面。参加这次会议的50多名专家,分别来自俄罗斯、日本、中国台湾、香港和中國大陸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提交的论文近50篇。他们以“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为主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长时段、多角度透视近世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探讨中国经济加速实现新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于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演变,专家们认为,这里的关键在“选择”二字。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中国人民一直都在不断地“选择”、“再选择”。通过对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的历史考察,学者认为近世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1860-1927)、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27-1949)、传统社会主义经济(1949-197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1978-2005)等四次(有学者则把清末、民国各分为一个阶段)模式选择,并分别形成了清末民国前期“近代经济的初步发展与社会失控”、民国后期“权威政府重建的整合绩效与战乱迷雾”、新中国前期“全能政府的创造性实践与体制性危机”和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瞩目成就与发展动力的倾斜”等四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并在总结与承传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新世纪初期选择了具有浓厚生态文明内涵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它受每一历史时期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问题的制约。因此,任何发展模式都是针对当时最迫切、最重要问题而设置的,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问题,而且常常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可能,即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同时激化了另一个问题,取得了这个成果可能

同时埋下了那个隐患。中国人民对自己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认识,就是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前人局限和深化国情与经济规律认识的过程。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大部分年代,世界各国真正选择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为数甚少。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0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旋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中国则是在20世纪少数几个选择自己独特道路从而真正创造自己历史的国家之一。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20世纪下半期中国则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模式。最后,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确定了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历史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模式与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决定,构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创造的主线。

认识与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人类社会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专家们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探讨了两次“西学东渐”的积极成果和反思“GDP崇拜”或“GDP情结”后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营理念是工业主义,现有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则又是“走俄国人的路”之结果。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而是要适应国情,适应它所处的时代,走出有自己特点的道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工业化的征程要从国情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又要及时研究和汲取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然而,自晚清以来,中国逐渐累积并在社会上下都普遍存在的“现代化焦虑症”,对我们以科学发展观审视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影响重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立足于追求GDP增长的速度,“以GDP论英雄”;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是“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生活”,忽视了内部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甚至牺牲了环境和资源的平衡。这种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自“一五”时期就已形成。它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代化焦虑症”,直至现在也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有某种程度的加重趋势。这一问题不仅仅反映在政府领导者及其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反映在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互相攀比和浮躁心理,实已经成为一个不容漠视的社会精神疾患,并且已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或使原有矛盾进一步加剧。这给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整个中国社会实现全面发展设置了巨大障碍。中国现代化既不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又要避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既要通过加快发展逐步解决,又不能消极等待发展来解决;根本出路就是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从GDP增长至上战略转变为可持续、可循环、两个和谐的协调融合式发展战略,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既促进当前实际实施的“粗放非环保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环保型经济增长方式”,又要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使民众力量影响并参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保障走“绿色”与“和谐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十分及时,更体现了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的迫切性,对我国选择走新型现代化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政府与市场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是会议讨论与本论文集关注的另一热点。专家们认为,在中国一百多年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中,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则一直在进行调整并与之形成互动。不论是清末北洋近代产业的初步发展与乱象,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的绩效与问题,也不论是共和国初期全能政府的创造与危机,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杂音,都与政府能否真正承担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紧密相连。就政府职能而言,其经济管理职能绝不是要不要、大与小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职能强化或削弱的问题,而是政府与市场职能如何正确分工、准确定位的问题,即既不“缺位”也不“越位”,而应在实践中全面落实“到位”的问题,是强化政府履行本应“到位”的职能问题。有学者认为,民国、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特征非常明显,而晚清时期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对于扩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则不可能有最大化的积极性。有的学者则在对中国早期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后指出,政府及其洋务官僚的支持和参与或主导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关键力量;若非如此,中国到何时才能出现具有规模的新式近代工业!与此同时,市场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也为众多学者所关注: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主体——商人资本的形成,使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结构开始向社会主导型的市场结构转变;这一进程是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主流。有的论文则认为,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使之在经济层面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不足,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形成对国外市场与外部刺激的壁垒;当外部刺激无法抗拒时,清代成熟的国内市场与经济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主动改变以适应各种变化,并从而导致近代中国经济趋于崩溃的边缘。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市场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货币,也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市场交易奸弊丛生。在旧中国市场上,该有的规范没有,有的只是过多的关卡和苛捐杂税,过重的交易费用,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危机;这是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论,不是市场经济过头的问题,而仍然主要是市场发育不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越位”与“缺位”上。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远没有结束,需要我们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吸收自己的和别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避免在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问题上犯大的错误。会议与本书作者的共同认识是: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新世纪中国选择与坚持融入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实现下一步战略目标的关键。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共同协调发展,要实现生产增长、生活提高、生态改善和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

研讨会能够顺利召开,得益于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支持与帮助;与会专家学者们为会议提供了近 50 篇高质量的论文,根据会议主题和篇幅的限制,论文集选取其中近 30 篇集结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辛康南编审对论文集的出版给予了诸多帮助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7 年夏月

目 录

前言	温 锐(1)
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	刘国光(1)
模式选择与经济变迁	
——近世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考察	温 锐(9)
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期问题分析	陈勇勤(19)
“西学东渐”与科学发展观	颜鹏飞(30)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观与中国的历史意义	
——兼评弗兰克·贡德的《白银资本》与“全球体系史观”	赵凌云(47)
社会主义：趋同论或者“第三种道路”	柳·伊·康德拉绍娃(61)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市场近代化趋向	刘方健(65)
明清晋商与中国传统市场转型述略	刘建生、刘成虎(76)
近代中国市场发展与危机刍议	陈争平(89)
中国近代机器工业首先选择国有制度的经济分析	龚立新(95)
1842—1984 年湖北省经济管理演变的轨迹	赵德馨(99)
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体制与政策目标模式选择的经验分析	赵梦涵(112)
1953 年“修正税制”的前因后果	武 力(119)
20 世纪 50 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	董志凯(140)
经济理性与政治正确：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	
后的陈云与毛泽东	谢国兴(156)
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1893)的官僚化现象	赵善轩(181)
试析战时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	郑会欣(193)
白银外流与近代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变迁(1800—1935 年)	
.....	王玉茹、燕红忠(210)
利用与改造：1949 年后江南典当业的命运	杨 勇(227)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农村私人借贷政策演变的历史考察	常明明、苏少之(238)
略论国家商业信用政策的演变	赵学军(253)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政府行为分析	邱贵明(267)
中国农村开发与村级领导能力	
——以北京远郊 X 村蔬菜批发市场为例	田原史起(272)
我国宪法有关经济制度内容变动的表现与特点	李正华(282)
民国时期江西义图制下的赋役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龚汝富(290)
农村宗族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汪忠列(306)
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下的北京政府时期审计	方宝璋(314)
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辑要	杨丽琼(331)

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

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 刘国光

摘 要: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关键在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公平 效率 和谐

(一)

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关系在我国讨论,已有好些年头了。2004年夏天以来,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辩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又一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讨论。这次讨论不是完全无效果,讨论中出现了不少精彩的文章。讨论的成果有助于改善我国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现状。

在效率与公平的天秤上,争论的一方强调的是效率,而较少注意公平。他们认为,只要能够使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什么改革手段都可以用,诸如在我国现有情况下MBO,即管理人收购的办法也可以用。如果有能干的管理人收购了国有企业,把它搞活,总比让它逐渐“冰棍消融”为好。因此“纠缠分配问题没有意义”。争论的另一方则以社会公平的名义,竭力反对在目前法律缺位、国有资产真正主人翁也缺位的情况下,将国有资产贱价或白送给少数人,让他们一夜暴富。

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强烈的公共政策问题。所必,争辩不但有学者参加,而且有公众参加,这是应该肯定的。这次讨论,大量公众参与网络媒体的活动,是我国公民公共政策意识增强的表现。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赞成上述后一方的意见,表明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说,后一方是占了辩论的上风。所以,前一方就责难对方“引爆了公众不满国资流失和社会分配不公的情绪”,有把不应当由公众讨论的“潜规则”拿出来公开讨论的说法!

再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来说。国资委经过众机构的调查研究,确认了MBO在我国现行情况下问题很多,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于是对MBO的政策调整了说法,由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反对管理者收购”,到“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

业不宜实施管理者收购”，到最后断然宣布“国有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者收购”，中小企业只能在极严格的条件下公开公正地试行。这也可看做对公众舆论的回应，虽然官方没有那么说，但如果说一下，也不见得有损权威机构的尊严，反而会获得反映民心 and 民众支持的赞誉。总之，这次争论的结果，无论从舆论上说或从决策上说，都在效率与公平的天秤上，添加了公平的份量，略微校正了过去偏于一方的倾向。

(二)

本来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越平均，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效率自然会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从另一角度说，不提高效率，蛋糕做不大，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效率和公平从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不容易。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很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他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社会公平、福利的措施，实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完备得多。当然这有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好简单地类比。

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2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10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十四大的决议。但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即次要地位。两个“兼顾”意义很不相同。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每次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都这么提，直到如今。所以，它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分配政策上要把公平与效率相比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也与我国

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及其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有密切关系。这种情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实力。所以,邓小平南巡讲话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了更快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实行“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一句话也正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所作的说明。

因此,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理论界阐述和宣传这一分配政策的精神,也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敛聚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三)

回过头来看国资流失造成少数人暴富问题。为什么经济理论界有人宽容这种现象甚至为此辩护呢?除了别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外,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进入了“产权改革”阶段有关。“理顺产权关系”是1992年十四大提出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立包括“产权清晰”在内四个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此后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展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产权改革”是一个新概念,探索产权改革的理论和途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缺乏经验,要借鉴现代市场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于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应运输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市场经济运作机理的分析上,不是没有可以借鉴的东西。但在中国传布这一学派的部分学者,却借此转换命题,在产权改革问题上曲解国有产权不清晰,暗地或公开地宣扬和推行(通过他们的影响)国企私有化的主张,利用国有企业改制之机,制造大量社会不公的事实。这就大大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相悖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我国改革中,只能“适我所需,为我所用”,断然不能让它主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学界应有的认识,也是一些经济部门的决策官员应该

注意的问题。

(四)

我在 2003 年《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一文中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许多同志把这一方针视为市场经济不易的法则,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就没有这个提法。我指出,我国这一提法的准确性、时效性,仍可以有讨论的余地。

随着总量发展、经济效率问题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会逐步上升为突出的问题。不能忘记,邓小平在 1992 年就对突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做出前瞻性的论断。他曾设想,在 20 世纪末到达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到世纪之交,我们并没有按照邓小平的预示,突出提出和解决贫富问题,调整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关系。在前述文章中,我曾以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处于倒 U 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收入差距客观上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一时难以倒转,隐含地解释邓小平的预言可能乐观了一点:看来要到 2010 年人均收入达到 1500 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有可能倒转下降。那时才有可能开始突出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效率与公平优化结合”的过渡。

当时学术界就有人针对我的意见,认为不能把突出解决贫富差距和改变效率公平关系推迟到 2010 年以后。因为“中国人对贫富差距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目前改变适当其时”。最近也有文章指出 10 年前就有人惊呼我国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这不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收入差距是否已经扩大到中国人承受能力的极限问题,当然也可以讨论。在上述文章中,我曾说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受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影响。虽然消灭城乡差距是我们今后努力以赴的目标,但是历史形成的巨大城乡差距是一个客观现实,农村居民知道一时难以攀比城市生活水平,所以承受能力还是有较大的弹性。我国人民对基尼系数在客观上继续上升还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不过我现在重新考虑,收入差距扩大是否到达承受极限的问题,同校正效率公平的关系、近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到承受极限,很可能与到达两极分化相联系。我们现在显然不能说已经到达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说改革失败的标志),也不能说到承受极限。基尼系数客观上还处在上升阶段,如不采取措施,则有迅速向两极分化和向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份量。第一步可以逐步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